

绪 言

公元二世纪 有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荀悦 本着‘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的救世热忱 写了一部叫做《汉纪》的书。在书中 他对周秦以来的贪秽之俗作了强烈的抨击。而被他指为末世贪秽的习俗当中 就有我们关注的对象 曾经在中国历史上演出过无数壮烈之举的游侠。他是这么说的：

世有三游，德之贼也。
一曰游侠，二曰游说，三曰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此三游者，乱之所繇生也。伤道害德，败法惑世，夫先王之所慎也。

显然 在他看来 游侠、游说和游行三者 都是大违道德礼义，不拘成法 乃或对先王先圣确立的礼治社会构成威胁的危险分子。他们不遵礼义纲纪和等级制度 去应奉之职守 当务之正业，

而追求自己的声名 偏逞个人的私臆 实在是妨碍王化的罪魁祸首。并且 文中将游侠列在“三游”之首，似可看出他对这一种人的不满 是异常强烈的。



春秋许国持节符使者像

东晋顾恺之《列女图卷》局部

前往联络。如何运用个人智慧完成君命 是他们必须

为了便于了解游侠活动的历史背景 我们不妨先从游说游行的崛起说起。游说，顾名思义 是指靠说辞耸动主人 以求进用之人 所谓“谈说之士资在于口”^① 这类人物 正如作者在同一段文中所说，“本生于使乎四方 不辱君命 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国家”。春秋之时 各诸侯国交往频繁 国与国之间 有诸如攻战、会盟之事 都会派使臣

面对的问题。特别是弱国之使出往强国 如何维护国家利益 不丧权辱国 对他们来说更是一个考验。在这方面,《左传》一书为后人留下许多宝贵的史料 使我们据此得以想见昔日使臣们的风采。再看游行 作者也说得明白 它“本生于道德仁义 泛爱容众 以文会友 和而不同 进德及时 乐行其道 以立功业于世”。也就是说 他是仁义贤达之士以道义相交 由以文会友达到以友辅仁的目的 而决非结党营私用逞私欲者可比。

然而 正如作者所言 到了周秦之末 情况改变了。春秋末、战国初 随着周天子天下共主地位的丧失 奴隶制度的迅速瓦解 以及随之而来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萌芽和确立 甫登历史舞台的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调整策略 开始为谋求天下霸主地位而活动。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礼贤下士 广揽各种人才以为辅政之需 以至战国时期 有布衣为相的情况出现 一般的敢任善任不次提拔就更为常见。与此相伴随 原为奴隶主贵族最低层的士阶层开始活跃起来。本来 这种被称作“士”的人 拥有一定数量的食田 接受过“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教育 平时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则充任下级军官;“大抵皆有职之人”^① 待春秋末期,社会急剧转型带来的社会成员的结构变动,一下子把他们抛散向社会的各个角落 许多士再无田可食 也无原职守可奉 剩下的只有一肚皮知识和还

顾炎武《日知录》卷七。

可以一用的勇力。凭借着这种知识或勇力 他们或讲学授徒 或襄赞典礼。当然 也有人投身政治 谋求改变自身地位的新一茬奋斗。所以 当各国君主急揽人才辅政之际 他们是乐于为君用的。他们连同在新兴地主阶级和一般平民中新涌现的知识者 共同构成了战国时期新的士阶层 并进而成为各国君主重要的依靠力量。与此密切相关 为达到出人头地的目的 一些人或从师问学 以伺进机 或交友结党 用为援手 想方设法养大自己的名声 求取人主的垂顾 所以在游说者日众的同时 游行者也因此大大地增加了。

那么 何以在游说、游行者并出的同时 其作为个人的品节会被荀悦认为越来越低下糟糕呢？这与东周以降 奴隶制终结、礼乐崩坏的政治形势有很大的关系。在当时政治形势酿成的社会氛围中 上至人君、下至一般士人 人人怀自利之心 风俗人心不免日趋浇薄和衰败。清人顾炎武就春秋与战国时期风俗的不同 做过一番比较 就很能说明问题。他说：“春秋之时 犹尊礼重信 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 春秋时 犹宗周王 而七国则绝不言周矣 春秋时 犹重祭祀聘享 而七国则无其事矣 春秋时 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 春秋时 犹宴会赋诗 而七国则不闻此矣 春秋时 犹有赴告策书 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 皆变化于此百三十三年之间。”^①这“邦无定交 士无定主”可以说是前面诸项

礼义缺失导致的结果。所谓“士无定主”是说当日士人的宗国观念淡薄，惯于附势趋利，哪里有利自己的发展就往哪里凑。由于他们撇开了先前礼义规范的束缚，一切言行皆根本于一己之私利，所以做出了许多为当时或后世正统士人所不齿的事来。荀悦在文中称游说“失之甚者，至于为诈给徒众”；游行“至于因事害私，为奸宄”即据此而言。

游侠的产生，有着与上述两类人共同的历史背景。如果说，游说、游行是值社会大变动时代，旧贵族势力崩溃，中央与郡县行政机构尚未健全，社会等级及利益的重新划定尚未完成时，纷起并作，急欲凭才智谋取地位的话，那么，游侠同样是趁此百废待兴之机，特别是国家政治运作和法制建设尚未走上轨道之时，乘隙而奋盛于一时的。故荀悦说：“凡此三游之作，生于季世，周秦之末尤甚焉。上不明，下不正，制度不立，纲纪废弛，以毁誉为荣辱，不核其真，以爱憎为利害，不论其实，以喜怒为赏罚，不察其理。上下相冒，万事乖错，是以言论者计厚薄而吐辞，选举者度亲疏而举笔。善恶谬于众声，功罪乱于王法。……是以君子犯礼，小人犯法，奔走驰骋，越职僭度，饰华废实，竞趋时利。简父兄之尊而崇宾客之礼，薄骨肉之恩而笃朋友之爱，忘修身之道而求众人之誉，割衣食之业以供飧宴之好，苞苴盈于门庭，聘问交于道路，书记繁于公文，私务众于官事。于是流俗成矣，而正道坏矣。”将游侠与前两者一律看做是末世风俗衰败的结果。尽管是站在正统的立场谴责“三游”，但在一个无

序的社会里 有一群漠视成规 以自己的原则行事的游侠产生 实在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以后 苏轼由前及土的失职 分析何以到战国时游侠崛起 任侠之风弥散的原因 说得更为剀切：

夫智、勇、辨、力，此四者皆天民之秀杰者也，类不能恶衣食以养人，皆役人以自养者也。故先王分天下之富贵，与此四者共之，四者不失职，则民靖矣。……六国之君，虐用其民，不减始皇、二世，然当是时，百姓无一人叛者，以凡民之秀杰者，多以客养之，不失职也；其力耕以奉上，皆椎鲁无能为者，虽欲怨叛，而莫为之先，此其所以少安而不即亡也。始皇初欲逐客，因李斯之言而止，既并天下，则以客为无用，于是任法而不任人，谓民可以恃法而治，谓吏不必才取，能守吾法而已。故堕名城，杀豪杰，民之秀异者，散而归田亩。向之食于四公子、吕不韦之徒者，皆安归哉？不知其能槁项黄馘以老死于布褐乎？抑将辍耕太息以俟时也！秦之乱，虽成于二世，然使始皇知畏此四人者，有以处之，使不失职，秦之亡不至若是速也。

推原苏轼的意思 他认为智勇辨力之士的失职 是导致秦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 同时也是导致游侠游士崛起的原因。联系前述春秋奴隶制时代 封建全盛 井田未坏 所谓士者都为主上所养 百姓安于耕凿 很少有浮游无食之人 及封建井田制崩坏 诸侯大夫亡国败家

之事接连发生 已无力顾及养士 有的则骄奢淫侈 根本无意恤士 终使士人“降在皂隶 于今为庶”成为流离失职之人 而一般平民有才智者 纷纷覬为士者的实际情况 及以后王夫之所谓“秦灭王侯 奖货殖 民乍失侯王之主而无归 富而豪者起而邀之 而侠逐横于天下”^①他的论述基本上是可以成立的。在文中 他分士为智、勇、辨、力四类 智、辨即智能之士 善辩之士 属于偏尚用文一类 与之相对 勇力之士 则偏属用武的一类。结合荀悦所论“三游”看 毋庸置疑 这游说、游行之士出于前者 而游侠则出于后者 出于那些不甘息声田亩老死沟渠的豪纵不羁的勇力之士。

因此 接着必须考察一下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 以便对游侠社会角色的定位 能真正符合当时的历史情势。

应该说 古代所谓士 大都是武士。如前面已指出的那样 他们平居时为卿大夫家臣 统驭百姓 战时则执干戈 卫社稷 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对此 今人顾颉刚从古代学校即军政训练之所的角度 作过专门论述。他认为古时设庠序学校以教 这庠、序、学、校四者 在当时皆是被人用来肄射习武的。“其所以习射于学宫 驰驱于郊野 表面固为礼节 为娱乐 而其主要之作用则为战事之训练。”^②以后 杨宽通过论证西周大学为服从“国之大事 惟祀与戎”的训条 教学内容“以礼乐和射御为主” 西周大学教师称“师”。

^①《读通鉴论》卷三。

^②《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卷7期，1940年。

乃或当时称教师为“夫子”，皆是对军事名称之沿用，有力地支持了他的论说。那么，武士是何时转变为后世的文士的呢？顾氏以为是在春秋末期，并举孔子死后，孔门弟子日渐倾向内心修养，不再以武事为急，甚至羞言戎兵以为说明。不过他同时指出，战国时期，时人“慷慨赴死之精神且有甚于春秋，故士之好武者正复不少，彼辈自成一集团，不与文士混。以两集团之对立而有新名词出焉：文者谓之儒，武者谓之侠。儒重名誉，侠重义气。……古代文武兼包之士至是分歧为二”。

美籍学者余英时基本同意这种说法，但同时又指出顾氏前后行文至少存在如下两处矛盾：文士与武士既属分途发展，则不能说武士蜕化为文士，此其一；其二，文中既称“古代文武兼包之士”，则不能同时又称“古代之士皆武士”^②。其实，这是顾氏行文逻辑稍嫌混乱所致。察其本意，是想就最早的源头指出古代之士皆武士，而又提出“文武兼包之士”，表明他对古代士的真实情况是了解的。至于文武之士分途发展，则是就其流变而言的，与武士蜕化为文士这一对源的解说并不相悖。

武士，或者说，古代受到过六艺教育并文武兼备之士，至战国时分化为文、武两途，是与当时大变动的

《我国古代大学的特点及其起源》，《古史新探》第 207 页，中华书局 1965 年版。

《古代知识阶层的兴起与发展》，《士与中国文化》第 2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

社会形势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说 当日各国统治者为了谋取霸主地位 争相揽士 而士人为改变自己失职的处境 以求有所发展 也乐于为人主所用。依他们所受的教育而言虽颇全面“春秋教以礼乐”使他们知礼能武“冬夏教以诗书”又使他们会断章取义 赋诗以言志。但依各人情况而言 总有长于文章辞令和长于射御攻战之别。前者发挥其所长 宣扬礼义教化而成儒 主张兼爱非攻而成墨 鼓吹现时功效以干时主而为纵横家 后者发挥其所长 则为奋死无顾忌的勇士 乃或替人打仗、任气尚义的侠士 原是很自然的事 并非顾氏率意妄断 或为行文之便 偏举两端以为对待。故此 这一说法赞同者较多 而其中吕思勉所谓“好文者为游士 尚武者为游侠”^①应该说最为简切允当。他不说好文者为儒，而泛言为游士^② 似更符合当时的社会实情。

战国之士分而为两途 好文者为游士 好武者为游侠 还可以从时人对士的称谓中得到证明。战国时期所谓士有多重含义 就类别而言也有各种各样的分法。如《墨子·杂守》分为“谋士”、“勇士”、“巧士”、“伎士”等几类，《商君书·算地》则分为“谈说之士”、“处士”、“勇士”、“技艺之士”、“商贾之士”五类 他如《庄子·徐无鬼》更将之细析为十二类。不过 总括这

《秦汉史》第 517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 年版。

“游士”一词最早似出《管子·小匡》篇之“齐桓公招游士八千，奉之以车马衣裘，多其资粮，财帛足之。使出周游于四方，以号召收求天下之贤士”，可为参看。

一时期的文献 则大抵有文士、武士、低级官吏、技艺之士、商贾之士、方术士等六类^①。



战国 木雕武士俑

文士又可分成如下几类：一是以道德节义著称的道德之士，包括所谓“通士”、“直士”、“志士”、“修士”；一是崇尚学识的才智之士，包括“文学之士”、“辩士”（又称“弘辩之士”、“辩说之士”、“辩知之士”）；“法士”（又称“能法之士”、“法术之士”、“智术之士”、“法律之士”）；“游士”（又称“游说之士”、“言谈之士”、“谈说之士”）等。当然，还有“居士”、“处士”、“隐士”这类清静无为之

人。前及游说、游行，多出于“辩士”和“游士”之中。

武士除被称为“农战之士”、“列阵之士”、“持戟之士”的国家武装力量外，尚有“力士”和“夹士”两类。前者指力大而勇悍的壮士，在当时多充任权贵的护卫，也有被用为高官的，如秦武王时，“力士任鄙、乌获、孟说皆至大官”^②。后者专能见义勇为，不避危难，且轻生重气，虽死无悔，因此时人又称其为“烈士”。

见刘泽华《战国时期士考述》，《郑天挺纪念论文集》第12页，中华书局1990年版。

《史记·秦本纪》。

“勇士”如聂政就被称为‘勇敢士’^①。

其他如技艺之士指有一技之长和专门技能之人，他们‘不垦而食’是所谓手工业者。商贾之士以经营货物买卖为生计，目的在逐利，尚不得归入文士或武士一类中。但低级官吏在当时多指司法官的属吏，如《孟子·告子下》有‘管夷吾举于士’，赵岐注曰‘士，狱官’，或者指在基层治民的官员，如《管子·八观》中称‘里尉’为士，《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还有‘士吏’一词；当然，也有用以泛指各种属吏的。方术士指卜巫、相面和堪舆之人，他们多是一些破落的读书人，当时颇为活跃，有的还得有机会参与政治，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可以归入偏尚用文一类的。据此，我们可以说，当日士阶层中人以性分所近，各趋所欲，大体而言，确乎存在着不是用文就是尚武的情况，说游侠起于武士，也大致符合历史事实。

为了清晰而深入地说明游侠社会角色之所属，我们不惜花较大的篇幅，回溯古代士阶层的发展变化过程。不过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里将游侠视作士阶层的一分子，是就春秋、战国游侠初起时的情形说的，而秦汉以后，游侠的来源变得十分复杂，成分淆乱不易究诘，是否都是士阶层中人就很难说了，至于是否都由武士转换而来，更大可置疑。并且愈往后，就各个因素综合考察的结果看，真正属于士阶层的游侠愈来愈少，社会对他们的认识也愈来愈不同。如前及荀悦

《战国策·韩策二》。

称“游侠之本生于武毅不挠，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见危授命，以救时难，而济同类，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为盗贼也”。虽以其源出正义，然大要在严辞否定。而此前司马迁对其却极尽彰扬之能事，称其“盖亦有足多者焉”^①，“义者有取焉”^②。

汉以后，历代人对游侠的评价也是各主所是，多有不同。但自《史记》、《汉书》之后，其活动已不再见载于封建正史，后世学者以及今天的研究者遂据此以为经两汉后，游侠已基本消亡。如顾颉刚就说：“儒侠对立，若分泾渭，自战国以迄西汉殆五百年。……范晔作史，不传游侠，知东汉而后遂无闻矣。”^③孙铁钢也说：“二十五史中，只有《史记》与《汉书》有《游侠传》，自《后汉书》迄《明史》都无游侠列传，这正可看出自东汉以后游侠已经没落，不再为史家所重视。”

游侠的人格既是那么的复杂，它夹杂着崇高、伟大和悍顽，难以一言评说；游侠的行为既是那么的爽朗、放达，以至流于乖张，然而它们却能直接诉诸人的情感，千载之下，几乎不待理智的消解和知性的过滤，便能激起一代又一代人的共鸣，让人读他为之神旺，谈他手足舞蹈，不能不说是一件值得人玩味的东西。只是，游侠的真实面目因封建统治者的裁抑翦灭，正

《史记·游侠列传》。

《史记·太史公自序》。

《武士与文士之转换》，《责善半月刊》1卷7期，1940年。

《秦汉时代士和侠的式微》，《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1975年

统史家的摒弃不录 抑或还有游侠自身生活理想、处世方式的种种限定，一直模糊不可辨识 这又不能不说是一件至为遗憾的事情。

第一章

游侠：一种特殊的社会人群

游侠由战国时士阶层分化而来，在当日急剧的社会变动中奋盛于一时。那么，到底什么是侠，游侠的社会面貌是怎样的呢？进言之，游侠属于士阶层中偏尚用武一类，作为一特殊的社会人群，他与其他相关人群的关系是如何的？与当日同样由士建立的诸子学说是否存在着思想联系？他在那个纷乱无序、动荡不居的变革时代，又能否构成一独立的社会集团？所有这一切，都是深入研究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因此，在展开对游侠发展历史的纵向寻绎和其社会关系、行为方式以及人格特征的横向考察之前，有必要对这些问题一一作出基于史实探索的合理判断。

释名与异称

依现存的史籍，尽管《庄子·盗跖》篇有“侠人”之说，《吕氏春秋·音律》篇也有“侠”字出现，但最早提及侠之名并对其作出论断的是《韩非子》。韩非在该书的《五蠹》篇中，曾对游侠作了猛烈

的抨击：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

联系该篇其他段落的论说来看 这里所说的“儒”指“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 盛容服而饰辩说 以疑当世之法 而贰人主之心 这批人 也即《八奸》篇所谓 为人臣者求诸侯之辩士 养国中之能说者 使之以语其私”中的“辩士”和“能说者”。所说的“侠”则指“其带剑者 聚徒属 立节操 以显其名 而犯五官之禁”之人 也即《八奸》篇所谓 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中的“剑客”、“死士”。在《五蠹》篇中 另有“游侠私剑之属”、“国平养儒侠”等语，则是对游侠的直接指称。

韩非重法 以严刑峻法作为治理国家的根本。依着对人性会随文明转进而日趋刁伪的认识 他坚决主张排斥那些“文学之士”和“辩智之士” 因为这些人学道立方 语曲牟知 心有主见而不易调派 凭着一己的闻知和自主意识，足以对专制君权产生情感上疏离，乃至构成对法的反叛。与此同时 他对那些行剑攻杀的侠也十分反感 认为这些人以私剑之悍 铤而犯险，直接危害法制 却被人目为“礪勇之士”是极不正常的现象。在他看来 耕战是国家之大事 所以应使耕者 那些“力作而食”的“生利之民”能富 让战者 即那

些‘寡闻从令’的‘全法之民’得贵。倘颠倒过来“富国以农 距敌恃卒 而贵文学之士 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 举行如此 治强不可得也。”

基于此 他提出自己最基本的治国之术 即‘无书简之文 以法为教 无先王之语 以吏为师 无私剑之悍 以斩首为勇’。文中‘无先王之语’针对乱法之儒言；‘无私剑之悍’针对犯禁之侠言 是至为明显的。此外 在《八说》篇中 他还提出‘人臣肆意陈欲曰侠’，“弃官宠交谓之有侠”这两种人或比前述的‘剑客’“死士”地位高些 但不服从君主的权威 不遵守国家法令则如出一辙。

行文及此 不妨再结合‘侠’的文字学解释 来进一步探讨韩非所谓‘侠’或‘游侠’的内涵。在今天可见到的商周甲骨和金文中 尚未见到‘侠’字 而只有“夹”其形似中间站一大人 两边各有一人挟持。《说文解字》谓：“夹 持也 从大 侠二人。”至于‘侠’，《说文》释为‘俌也 从人 夹声’。段注引如淳言并发挥曰：“相与信为任 同是非为侠 所谓权行州里 力折公侯者也。或曰 任 气力也。侠 俌也 按侠之言夹也。夹者 持也。经传所假侠为夹 凡夹皆用侠。”

古代“夹”、“挟”、“侠”三字相通。“夹”的原义既是大者受两人持，《左传·僖公二十六年》也有“夹辅成王”之说，《汉书·季布传》颜注谓“侠之言挟也 以权力挟辅人也”衡以段注所引 可知‘侠’的原义当为挟持大人物并供其使役之人。自春秋而及战国 这些被称为侠的人羽翼日渐丰满 凭借着从主人那里获得

的权力 开始不顾君臣大义 好逞私勇 行犯上作乱之事。在当时“社稷无常奉 君臣无常位”的大争之世，他们的行为正足以构成对专制君权的威胁 所以韩非子才有“人臣肆意陈欲曰侠”的说法 并力主予以严厉制裁。

而就他们中的绝大多数而言 又只是以这些不法之臣为主人 并受其役使的。前及《五蠹》篇所说“为人臣者聚带剑之客 养必死之士以彰其威”又说“犯禁者诛 而群侠以私剑养”即可证明这一点。这些人与主人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主人可能对他们以礼相待 结以恩义 他们对主人的厚遇乃或知遇之恩自然须臾不忘，为其效力至于不惜身死。在两者之间，势必曾发生许多让人击节扼腕感叹不已的不平常之事，时人遂因其为侠者而称之为侠行。再扩而大之，他们那些重义节、轻死生之事 在当日纷争不息的社会广泛流传 依其行为作派而聚徒属 立节操 显扬声名的人自不会少。凡所作为有合乎他们行事原则的 其人也就会被人视为侠。韩非子称“弃官宠交谓之有侠”又可以证明这一点。所谓“弃官宠交”，依松皋圆的解释 指“弃官而爱交友者 如虞卿不重万户侯卿相之印，与旧友魏齐同行去赵之类”^①。虞卿之事 见诸《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虞卿时在赵国为相 他的朋友魏齐与秦相范雎有仇 亡奔赵国平原君，秦昭王听到消息后，逼迫平原君交人。魏齐见事急，

见陈奇猷《韩非子集释·八说》注引《韩非子纂闻》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4 年版。